

鲁迅与海涅译诗 及其他

吴晓樵

但海涅还是永久存在,而且更加灿烂...

——鲁迅《海纳与革命》译后

在本世纪初直至二十年代,德国伟大诗人海涅(1797 - 1856)在中国的接受主要是从抒情诗人的角度进行的。自三十年代起,海涅在中国作为政治诗人的形象开始凸显,鲁迅先生生前对海涅的理解、译介似乎也经历了这种接收视野的演变。

今天众所周知的是,鲁迅在留学日本时期用骚体韵文翻译了两首海涅恋诗。1914年2月,周作人在《艺文杂话》(发表于上海《中华小说界》月刊第一年第二期)中引用了这两首译诗。

这两首译诗在鲁迅生前和逝世后很长时间一直湮没无闻,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鲁迅逝世后,随着编纂鲁迅全集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完善,对鲁迅创作、翻译作品的辑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鲁迅翻译海涅诗的发现和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也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不小的收获。但是译诗的发现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四十年代,唐弢编选《鲁迅全集补遗》(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初版),最早将这两首海涅译诗作为鲁迅的译作收入集子。但是,当时由于轻信了一位“热心的读者”提供的“发现”,错误地著录了译诗的出处。这位读者——“文氓”史济行——提供材料时,隐去周作人引用鲁迅海涅译诗的事实,作伪谎称该翻译“1914年以周豫才的署名曾在绍兴《越铎日报》副刊上单独发表,题作《艺文杂话》”。后来,这一错误在《鲁迅译文全集·译丛补》中得到了纠正。

在译诗之前,周作人有一段关于海涅诗歌的介绍性文字,现同所引录的鲁迅译诗一并摘录于下,以

绘同好:

赫纳(Heine)者,德意志诗人,能以常言,抒其覃思,使字明瑟,而句复温丽雅驯,拟者不能一似,伯兄尝译其若干什,今录数首与此。

一曰:余泪泛澜兮繁花,余声徘徊兮莺歌。使君心其爱余,余将捧繁花而献之。流莺鸣其嚶嚶兮,傍吾欢之果蹻。

一曰:眸子青地丁,辅颊红蔷薇。百合娇洁兮君柔荑,吁嗟芳馨兮故如昨,奈君心兮早摇落。

据查考,这两首诗出自海涅最早刊行于1827年的《歌集》(Buch der Lieder,又译作《歌之书》)的第二部分《抒情插曲》(Lyrisches Intermezzo),分别是其中的第2首《从我的泪珠里》(Aus meinen Tränen sprie en)和第32首《蓝色紫罗兰》(Die blauen Veilchen der Äugelein)。《抒情插曲》中的诗作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隽永,具有民歌风味。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这两首诗歌的翻译可能产生于鲁迅在日本仙台留学时期(1904 - 1906年):“鲁迅学了德文,可是对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在东京虽然德文书不很多,但德国古典名著却容易买到,价钱也很便宜,鲁迅只有一部海涅的诗集,那两首‘眸子青地丁,辅颊红蔷薇’的译诗,大概还是仙台时期的手笔,可见他对于这犹太系诗人是很有点喜欢的。”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周作人再次提到鲁迅在德国文学中独取海涅的偏好,对这两首诗的翻译作了说明:“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在另一处,他又回忆说:鲁迅“在仙台所学的是医学专门学问,后来对于鲁迅有用的只是德文,差不多是他做文艺工作的唯一的工具。……他学的外国语是德文,但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歌德、席勒等大师的著作他一册都没有,所有的只是海涅的一部小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对于权威表示反抗。”综合周作人的回忆,鲁迅在日本所购得的海涅著作是一部四本的小集子,它是这两首译诗依据的底本。

周氏的回忆是具有说服力的,他对翻译时间的考定更是有着相当的文献价值。鲁迅译诗的风格也体现着他这一时期用语炼字的特点,“行文古奥、属句凝炼”,嗜好用冷僻的词句,正是所谓“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集外集序言》)的时候,与

写作用语艰深、古典的《摩罗诗力说》(1907年发表)时期的鲁迅是相符的。海涅的诗及其名字渐渐出现于中文杂志、为留意欧洲文坛的读者所知晓亦当在这个时期左右。我们从同一时期留学日本归国的王国维此间写作的介绍欧洲文学的论文中也间或可以找到海涅的名字。

周作人还将鲁迅后一首译诗同“差不多同时候”(1906年)翻译的作品《红星佚史》所收“十八九篇”译诗中“最有意思的”的一首相比较,认为前者“温丽雅驯,所以看去似乎更好”。对照上引鲁迅译诗开端的跋语可知,周作人“温丽雅驯”的评语看来既是对海涅诗歌的赏析,也是对鲁迅海涅译诗风格的评价。

顺便提一下,周作人对鲁迅与海涅关系的认识,也似乎有着一个过程,这从他一篇文章的修改细节上可得到证明。周作人于鲁迅逝世后的1936年11月7日写了《关于鲁迅之二》,在讲到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时,他是这样写的:“豫才于拉丁民族的艺术似无兴会,德国则只取尼采一人,……”。这是选入《瓜豆集》时的版本。此文后来收入1957年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这时作者对这句话作了修改,改为:“豫才于拉丁民族的文艺似无兴趣,德国则于海涅之外只取尼采一人,……”这种修改是出现在他发现鲁迅对海涅的特殊的、关系之后,也正是“海涅当年成风尚”(冯至诗句)的五十年代(1956年是海涅逝世100周年,在社会主义中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因此这种对鲁迅与海涅关系的发微似乎亦有着时代的背景在。

鲁迅早年对海涅诗歌的翻译至今一直被研究界视作是最早从真正意义上在中国译介海涅。但随着文献材料的深入发掘,我们发现与鲁迅同时还有他人的海涅译诗:胡适的《亥纳的诗》(1913年)、留学德国的应时(应泉)的《德诗汉译》(1914年初版,1939年再版)中的翻译(今均收施蛰存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

鲁迅后来还一直保持着对海涅的关注,直至晚年。1925年,他购置了德文本《海涅十三卷集》四册,不仅收有海涅的爱情诗,还包括诗人在结识马克思后创作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政治诗篇。1930年5月2日陈学昭还从国外赠送给他德文本的《歌之书》。我们在鲁迅的藏书中还发现有一册1929年X书店出版的青主(此系音乐家、德语文学翻译家廖尚果的笔名)翻译《海涅

最著名的爱诗》,这本藏书今天已成为稀见的珍本。同时鲁迅还始终关注着日本的海涅研究。他收藏有日本东京南山堂昭和二年(1927年)再版的粘谷真阳译的《海涅诗集》。1933年11月他发表在《现代》四卷一期上的翻译德国左翼文学评论家O.毗哈(Otto Biha)《海纳与革命》一文,则是根据日本海涅研究专家高冲阳造选编的《海涅研究》(日本昭和8年[1933年]6月东京隆章阁出版)中第八篇《海纳与马克思主义》的日译转译的。鲁迅在译后记中,说明了他译介此文的意义:“由这样的简短的文字,自然不足以深知道诗人的生平,但我以为至少可以明白(一)一向被我们看作恋爱诗人的海纳,还有革命的一面;(二)德国对于文学的迫害,向来就没有放松过,寇尔兹和希特拉只是末期的变本加厉的人;(三)但海纳还是永久存在,而且更加灿烂,而那时官准的一群‘作者’却连姓名也‘在没有记起之前,就已忘却了’:这对于读者,或者还可以说是有些意义的吧。”增田涉在回忆录中记载下了鲁迅晚年对海涅的珍爱,增田涉回忆说:“在他死前的三个月,经过数年隔别再访问他的时候,他的书房里,排列着崭新的《海涅全集》原文本,我说:‘是《海涅全集》啊!’并问他的用意所在。他说,想重读一下海涅。”

注 释:

周作人《艺文杂话》,载上海《中华小说界》第一年(1914)第二期。标点系引者所加。

周作人著、止庵编:《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169、422、431、143页。

孙凤城《过去、现在和将来——海涅在中国》、李智勇《海涅作品在中国》均持这一观点,见张玉书主编《海涅研究——1987年国际海涅学术讨论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97页。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第166页注2。

唐棣编《鲁迅全集补遗》,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10月版,第325-326页。

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三七 从尼采到海涅》,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第84页。

(吴晓樵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邮编 100871)